

周大璞著

训诂

在月今今

祠嗣王王王

家訛訛訛訛

大迷喪喪喪

解解于于于

司有命命命

適適要要要

即于于于于

西亦爾爾爾

文王王王王

改革革革革

岸岸岸岸岸



周大璞 著

训诂学要略

湖北人民出版社

训诂学要略

周大璞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潜江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875 印张 1 插页 119,000 字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700

统一书号：9106·45 定价：0.70 元

目 录

一 绪 言	1
(一) 什么是训诂学?	1
(二) 为什么要研究训诂学?	3
(三) 怎样研究训诂学?	5
二 训 诂 源 流	9
(一) 训诂的起源	9
(二) 训诂的发展上	12
(三) 训诂的发展下	23
三 训 诂 体 式 上	36
——随文释义的注疏	
(一) 注疏的名称	36
(二) 注疏的内容	49
(三) 注疏的分类	62
(四) 注疏的附经	66
四 训 诂 体 式 下	70
——通释语义的专著	
(一) 专释语义的专著	71
(二) 音义兼注的专著	101
(三) 形音义合解的专著	103
五 训 诂 条 例	110
(一) 释义的方法	110
(二) 行文的格式	118
(三) 常用的术语	126

六 训 诂 十 弊	140
(一) 厚古薄今	141
(二) 党同伐异	142
(三) 烦琐寡要	143
(四) 穿凿附会	143
(五) 增字解经	144
(六) 随意破字	146
(七) 误虚为实	146
(八) 拆骈为单	148
(九) 不懂古义	149
(十) 不通语法	150
后 记	152

一 绪 言

(一) 什么是训诂学?

我们研究训诂学，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训诂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任务是什么。

训诂学是语言学的一种。我国的语言学向来分为三门，即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研究文字的形体，音韵学研究语音，训诂学研究语义。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

“训诂”这个词很早就有^①。最初单称为“诂”，或称为“训”。“诂”字亦作“故”。汉代以后，才合称“训诂”，亦曰“诂训”。

关于“训诂”二字，从前有种种解释，这里略举几种：

《说文解字·言部》：“训，说教也。”“诂，训故言也。”段玉裁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分之则如《尔雅》析‘诂’、‘训’、‘言’为三，三而实一也。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毛诗》云‘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取故言为传，是亦诂也。贾谊为《左氏传训故》，训故者，顺释其故言也。”

张揖《杂字》：“诂者，古今之异言；训者，谓字有意义也。”（见陆德明《尔雅音义·释诂》）

郭璞注《尔雅·释诂》第一条云：“此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

孔颖达《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疏》：“诂训传者，注解

① 关于训诂的起源，下面还有专章讨论，这里暂不多说。

之别名。……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诂训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

马瑞辰《毛诗诂训传名义考》：“盖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对言则故、训与传异，连言故、训与分言故、训者又异。……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毛公传诗多古文，其释诗实兼诂、训、传之体，故名其书为诂训传。”

黄季刚先生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伸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此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见黄耀先先生《训诂说丛》）

以上几家的说法大同小异。他们都认为训诂就是解释的别名，也就是“以语言解释语言”。训、诂与传，对言有别，散言则通，马瑞辰的这种意见是正确的。郭璞指出训诂“所以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这比张、孔、段等只强调“释古今之异言”，而忽视“通方俗之殊语”，要高明一些，而黄季刚先生则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以为“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还不是训诂学最根本的问题。训诂学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用他的话说，就是“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

这也就是说，训诂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方法、条例，进而探讨语言文字的系统和根源。这个任务要比“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了。

黄先生对“训诂”二字的解释，也是富有创造性的。他把“诂”解释为“本来”，“训”解释为“引伸”，也就是说，“诂”是推求字的本义，“训”是探索字的引伸义和假借义。古代的训诂家在推求字的本义上是不遗余力的，而在探索字的引伸义和假借义上则很少用力，因此他们往往知古而不知今。黄先生则主张，搞训诂不仅要推求字的本义，也要探索字的引伸义和假借义。这就是说，不仅要知古义，也要知今义。黄先生的这种主张，我是赞成的。

我们知道，由于语言的发展，一般的词往往不只有一个涵义，有的有许多个涵义。比如：道、理这两个字，道本是道路的意思，由此引伸，于是有道理、道德、规律、方法、治理、引导、经由、讲说、料想等涵义；理本是治玉的意思，由此引伸，于是有治理、治平、修理、理睬、道理、理论、文理，以及狱官、使者、媒人等涵义。对于这种一词多义的现象，固然要推求它的本义，也要联系它的发展演变，找出这些不同于本义而又同本义互相联系的意义，即所谓引伸义或假借义。这样，就可以探索出由本义、引伸义、假借义组成的“词义系统”。训诂学所要探讨的语言文字的系统，首先就是这个词义系统。当然，训诂学的任务并不是到此为止，它还要从词义系统的研究中找出语义发展演变的内部规律，如大家所熟知的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等就是。这个任务，更加重要，也更加艰巨。

总之，训诂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词义和词义系统，它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语义发展演变的规律。

（二）为什么要研究训诂学？

斯大林曾经指出：“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之一。词语的

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当保证语义学在语言学中应有的地位。”^①这段话对训诂学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那么，训诂学在语言学中究竟是怎样重要的一部分？应当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训诂学呢？

这首先就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语义。我们知道，语言是用声音来表示意义的。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而语义则是它的内容。语言中每一个词都是有意义的，不了解它的意义，就不能用它来说话与进行社会交际和思维活动。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②如果我们对某种语言的词义没有正确的理解，怎么能运用这种语言来准确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呢？因此，我们大家对自己语言中每一个词都得掌握它的意义，研究语言学的人当然更应该如此。这就说明：研究训诂学是很重要的。

其次是因为训诂学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古代的语言和不同的方言。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卷十一里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这话说得不错，训诂学的功能的确是很大的。我们今天要批判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就要靠训诂的帮助，读懂古代的作品。训诂学的知识不是只对专门研究这一行的人才有用的。

再其次是因为训诂学知识还有助于语言学的其他部门的研究。比如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词典学等，和训诂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古代的字书，如《说文》、《字林》、《玉篇》等，都把释义和解形、注音结合在一起，并有所谓形训、声训，而语法的分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二六页。

② 转引自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二七页。

析，古代也往往包含在训诂之中，如果对训诂学一窍不通，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等学科也不容易学好。特别是词典学，和训诂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词典、字典的本身就包含着训诂，更需要有训诂学的知识，才能从事编写。

最后，从训诂学本身来说，也需要有一大批人对它进行深入的钻研。我国的训诂学虽然起源很早，历代的成就也很大，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原有的研究人员存者寥寥无几，亟须培养大批的新生力量，来批判地继承传统的训诂学，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统帅，逐步地把它改造成为真正的语言科学。

训诂学就是这样一门在语言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学科。当然，我们也要记住斯大林的教导，不要过高地估计语义学和滥用语义学，不要象马尔那样，认为思维“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而使自己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

（三）怎样研究训诂学？

怎样研究训诂学？毫无疑问，训诂学和其他科学一样，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统帅，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语义，要把语义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要扫清旧训诂学中脱离社会的谬论和唯心主义的臆说。为此，我们在研究训诂学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他们关于语言的论述。

其次，研究训诂学，必须建立历史的观念。王力先生说：“前人所讲字的本义和引申假借（朱骏声所谓转注假借），固然也是追求字义的来源及其演变，可惜的是，他们只着重在汉代以前，汉代以后就很少道及。新训诂学首先应该矫正这个毛病，把语言的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有同等的价值。汉以前的古义固然值得研

究，千百年后新起的意义也同样值得研究。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例如‘松紧’的‘松’字和‘大腿’的‘腿’字，《说文》里没有，因此，一般以《说文》为根据的训诂学著作也就不肯收它（例如《说文通训定声》）。我们现在要追究，象这一类在现代汉语里占重要地位的字，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至于‘脖子’的‘脖’、‘膀子’的‘膀’，比‘松’字时代恐怕更晚，但是我们也应该追究它的来源。总之，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虽然古今书籍有限，不能十分确定某一个语义必系产生在它首次出现的书的著作时代，但至少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出世不晚于某个时期。关于它的死亡，亦同此理。前辈对于语义的生死，固然也颇为注意，可惜只注意到汉以前的一个时期。我们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见《汉语史论文集》中的《新训诂学》篇）王先生的这个意见基本上是对的，问题只在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念，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还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念？我认为我们所应建立的历史观念，只能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而不能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念。这一点，我想王先生是同意的。再者，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念来研究训诂学，不仅要上下几千年地研究每一个词的意义演变，也要进行语义的断代研究。比如蒋礼鸿同志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训诂研究，在目前更为迫切需要。只有在这种断代的训诂研究工作作好以后，纵贯几千年的汉语语义发展史才能在这踏踏实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其次，研究训诂学，还要把语义同语音、语法以及字形结合起来研究，不能孤立地研究语义。语言是用声音表示意义的，而文字则是它的书写符号。意义同语音、字形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某种具体语言里，用什么声音和文字表示什么意义，一经社会中的人们“约定俗成”以后，就固定下来，不能由一个人任意改

变。比如“牛”不能改呼为“马”，“马”也不能改呼为“牛”。于是音义之间就有了一定的关系。加以词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可以引申演变，而语音往往不改。于是同一声音可以表示许多不同的意义，而音同音近的字又常常可以通假。比如“跳蚤”的“蚤”和“早晨”的“早”本是意义不同的词，但是古书里常有借“蚤”为“早”的，如《仪礼·士相见礼》：“问日之早晏，”注：“古文早作蚤。”《国语·周语》：“若皆蚤世，犹可，”注：“蚤世，即亡也。”也就是借“蚤”为“早”。又如“财”和“材”、“裁”、“纔”本来也是不同的字，但在《魏都赋》“财以工化”里，“财”借作“材”；在《荀子·非十二子》“一天下，财万物”里，“财”又借作“裁”；在《孙叔敖碑阴》“各遗一子，财八九岁”里，“财”又借作“纔”。碰到这种情况，训诂就必须结合语音来进行。《说文》解释形声字，有所谓“亦声”的说法，如：“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祐，宗庙主也。《周礼》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为主。从示从石，石亦声。”“袞，会福祭也。从示从会，会亦声。”这也是训诂与语音结合的一种方式。宋代人王子韶有所谓“右文说”，认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字从某声，即具某义。“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餐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戔为义也”（见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这也是采用音义结合的方法来搞训诂的，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有两个比较严重的缺点：一是局限于字形，不懂得音近义通，不限于声符相同的字。二是说过了头，不知道音同的字意义未必皆通。黄季刚先生说得好：“同音者虽有同义，而不可言凡。《淮南》‘蝨’与‘瑟’同音，周人谓‘玉’为‘璞’，郑人谓‘鼠’为‘璞’，此音同而不必义同也。物有同音而异语者，亦有同语而异音者。同音异语，如蝨与瑟；同语异音，如《尔雅》初、哉、首、基俱训始是也。同音者不必有一定之义，同语者不必一音，而往往同音，如江、河、淮、海、汉、湖、洪、沆皆大也，洪与红亦同，鸿、江亦有关。若言凡匣母字皆有

大义，则非也。”（见黄耀先先生《文字学笔记》，第23页）

训诂和语法相结合，前已指出，古代训诂书中往往有讲语法的，现在举两个例子：

《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休解诂：“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

孔颖达《毛诗·周南·关雎疏》：“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

这种寓语法于训诂之中，在古代训诂书里是“屡见不鲜”的，而且要弄清楚词义，往往也需要精通组词成句的语法，因此，我们研究训诂学，就不能不懂得语法了。

至于文字学，由于古代训诂书常常把文字的形、音、义结合在一起解释，而且有时还采用所谓“形训”的方法，如“人言为信”，“止戈为武”，“虫皿为蛊”，“反正为乏”，“背厶为公”等等，我们研究训诂学，当然也要有一定的文字学知识。不过，我们一定要突破文字形体的局限，不要为王子韶所迷惑，再去搞什么“右文说”。

二 训 诂 源 流

(一) 训 诂 的 起 源

我国的训诂起源很早，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在萌芽。当时我国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社会生产力日益增长，以汉族为主的各族的文化蒸蒸日上，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地发展。而由于诸侯割据，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于是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加以今语和古语的不同，人们阅读古典文献，往往不容易理解，因此需要有人来为他们解释古今的异语和各地的方言，训诂就应运而兴了。《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郑众注：“六书，象形、会意、转注、指事、假借、谐声也。”据此推测，当时保氏教贵族子弟学习六书，应该不只是为他们解释字形，也要使他们知道字的含义和读音。但是，不知道曾否编写过符合这种要求的识字课本。《汉书·艺文志》所载周宣王太史所作《史籀》十五篇，早已失传，想来也和现存的汉人史游《急就篇》一样，只是把常用的字编成韵语，以便诵读，而没有形、音、义的说解。尽管如此，先秦人解释语义的只言片语，在古代文献里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的。如：“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见于《周易·说卦》）“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见于《周易·系辞》）“止戈为武”，“反正为乏”，“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十五年及庄公三年）“彻者彻也，助者借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见于《孟子·滕文公上》）“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见于《老子·上篇》）“南溟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见于《庄子·逍遥游》）“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亼，背亼者谓之公。”（见于《韩非子·五蠹篇》）象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其所解释的，有的是具体的事物，有的是抽象的概念，有的是地名，有的是书名，虽然不一定都解释得很准确，但仍可以算是古代的训诂。

除了这些个别词语的训诂以外，在先秦还有一些为某一书作的说解。儒家有，别的家也有。就儒家来说，东汉的徐防说过：“《诗》、《书》、《礼》、《乐》，定自仲尼；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见《后汉书·徐防传》）即认为子夏的《易传》、《丧服传》等是儒家经注的鼻祖，而陈澧则认为儒家经注之祖是孔子所作的《易》的《十翼》（见《东塾读书记》卷四）。章太炎和吕思勉又以为孔子以前，儒家的经典已有传注。

章说见《国故论衡·明解故上》。他说：“单襄公论孙周曰：‘吾闻之《太誓》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语》）说曰：‘故，故事也。’（韦解）往者，宋之役，薛陈之受赐，其书皆在故府。楚申公得随咒之占于故记，故记者，藏在平府。汉亦有掌故官，其以说诗，有故训。然则先民言故，总举之矣。有故事者，有故训者。毛诗以外，三家亦有《鲁故》、《韩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斯故训之流也。《书》、《春秋》者，记事之籍，是以有故事。《太誓》有故，犹《春秋》有传。马季长以《书传》引《太誓》者，今悉无有，诚知所引在故，则可与理惑也。诸故事亦通言传，大史公曰：‘孔子序《书传》’，又曰：‘《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世家》）明孔子序《尚书》，兼录其传，故棘下生得通其文。墨翟说‘武王将事泰山隧’，此盖书之经也。次引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

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此则《书》之传也。（所引见《兼爱中篇》）”又说“以尚贤为政之本者，此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辅而身。’次引《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距年者，《汤誓》之传也。（所引见《尚贤中篇》，其下篇引作‘竖年之言曰：睪夫圣武知人，以屏辅而身’。）其引《甘誓》为禹誓，文亦增多（见《明鬼》下篇），明其在传中。孟子对汤放桀、武王伐纣之问，即曰‘于传有之。’传者，《书传》，及诸完廩、浚井、仇饷之事，皆能明征其状，非《书传》何所据依焉？娄敬引《太誓》，犹有伏生所不著者。敬犹习《书传》，得征其故。要之，《书传》素多族类，自孔子时已有数种。孔安国所以无记录者，以其故传具在。遭巫蛊，未施行，非独《逸书》二十四篇亡佚，虽《书传》亦蠹敝。”

吕说见《燕石札记》，其《传说记》条云：“陈氏澧曰：‘《荀子》曰：国风之好色也，其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大略》）据此，则周时国风已有传矣。《韩诗外传》亦屡称传曰，《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诗传》：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时之传也。’（《东塾读书记》卷六）陈氏所引，实皆孔门诗传，谓不知何时之传误也。然孔子以前，诗确已自有传。《史记·伯夷列传》引轶诗传是也。以此推之，《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书传’二字，盖平举之辞。孔子序《书》，盖或取其本文，或取传者之辞，故二十八篇，文义显分古近也。”其“《太誓》后得”条也有类似的说法，文繁不备引。

从儒家以外其他诸子的著作来看，在先秦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注解。如《管子》有《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就是对《牧民篇》、《形势篇》、《立政篇》、《版法篇》、《明法篇》的注解。又如《韩非子》有《解老篇》和《喻老篇》，就是对《老子》的注解。不过，这些注解只是通其指意，而不是逐字诠释罢了。

再如《墨子》有《经上》、《经下》两篇，又有《经说上》、《经说下》，这后两篇就是前两篇的注解，“说”就是注解的别名。《韩非子》的《内储说》和《外储说》，都先列经文，然后加以解说，和《墨子》的办法大致相同，只是有一点区别，就是《墨子》的解说多半是理论上的阐明，而《韩非子》的解说则是用许多故事来论证。

总之，到了战国末期，训诂已经由萌芽而逐步发展，它的对象已经不限于儒家的经典，体式已经多种多样，正如章太炎所指出，不仅有故训，而且有故事了。

（二）训诂的发展上

从西汉开始，训诂有了更大的发展，确立了两种基本的体式，即随文释义的注疏和通释语义的专著。

西汉时期，封建制度已经巩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较大发展，语言文字的变化也比较大，古文、籀书已成古董，篆文也逐渐被隶书所代替，加以去古渐远，古音古义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这种情况促进了训诂学的发展。于是训诂之学风行一时，特别是儒家经典的注解大批出现。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易》有《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韩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古五子十八篇、淮南道训二篇、古杂八十篇、孟氏京房十一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书》有传四十一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诂》二十九篇、《欧阳说义》二篇；《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礼》有《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周官传》四篇；《春秋》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